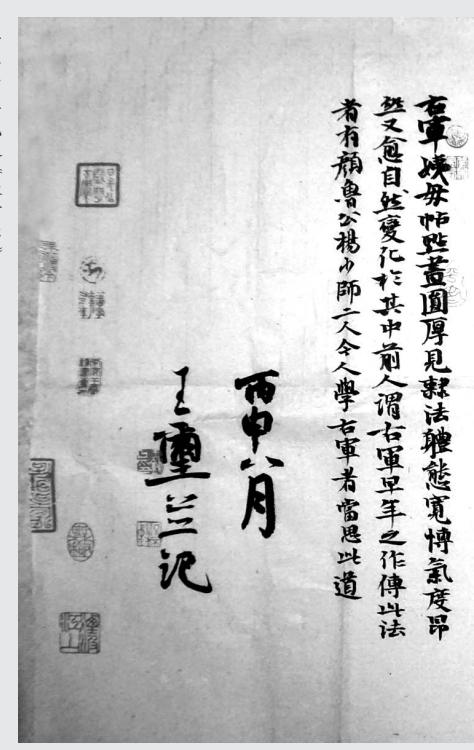


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温故知新——大家临帖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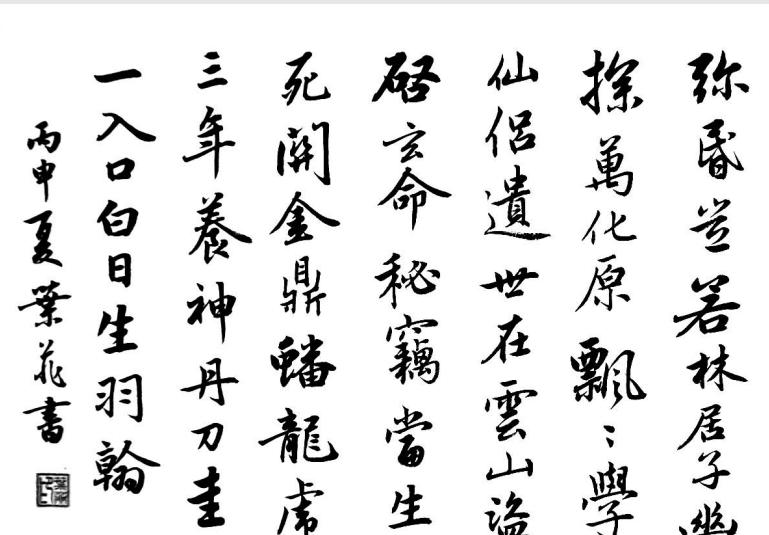
临书手记

赵孟頫的行书俊美纯熟、端庄稳健，清新秀逸，流露着浓浓的文人书卷气。《朱子感兴诗》是其晚年作品，用笔清秀苍劲，结字肥瘦参差，体势奇宕多姿，骨气隐含，具有中和之美。

赵孟頫在《松雪斋书论》中曾提到：“学书有二：一曰笔法，二曰字形。笔法弗精，虽善犹恶；字形弗妙，虽熟犹生，学书能解此，始可以语书而已。”可见笔法和字形结构的重要性，二者应是临帖首先要关注的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全篇的风格与气息，章法布局、墨色变化等也是临帖过程中要悉心学习的。

“先与古人合”，临帖是我化为古的取法阶段，必定是一个长期的学习和积累过程。

——叶菲



墨苑传奇四百年 (八)

墨言

曹素功不姓曹了？

20世纪初海派文化的兴起，带来了海上墨业的兴旺发展。上海市场上经营笔墨等文房四宝的店家曾多达185家、从业人员2200人左右。当然其中有些是只经营、不生产，甚至仅二三人的夫妻老婆店。而大的名家除曹素功，还有胡开文、詹大有、查二妙堂等，可以说是名匠汇聚，百商云集。

然而到了三四十年代，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。由于日寇入侵，人民生活水深火热，文化市场日渐萧条，笔墨庄有的关闭、有的躲进租街区，惨淡经营、艰难支撑。至抗战胜利后，市场刚恢复刚有起色，又接连内战，使制墨业陷入了更大的困境。

与此同时，传统笔墨业又面临着时代变革的挑战。随着“三笔”：铅笔、钢笔、圆珠笔的兴起和普及，作为大众化日常使用的书写工具毛笔和墨锭逐渐淡出市场，需求量锐减；书画艺术创作成为传统笔墨的主要功能，消费群体由社会大众缩小到书画家。为适应这一变化，笔墨业的发展由求数量转为求质量。

在这样情况下，那些三四人的小商铺、无生产能力的经销商基本退出传统笔墨经营，出现了行业性的大调整。1955年据上海市商业一局统计，当时上海市专营笔墨的商户已缩减至48家，从业人员422人。

然而，由于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律，此时留下的企业，均是相对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企业。

建国初期，百业待兴，国家经济恢复阶段，各行各业都自力更生，克服困难渡难关。在那段时间，曹素功墨庄也曾经受困难的考验。虽然墨庄实力坚挺，存有很多高质量良墨品，却一时缺乏周转资金，甚至有时连员工的薪酬也难以支付。为渡难关，商店有时竟忍痛将好墨砸碎了出售（因好墨若低价抛售，会影响信誉）。店主曹述雍还曾亲自带着墨品，拜访一些书画家，上门推销，当时不少条件较好的书画家当即慷慨解囊，毕竟墨是佳墨，物有所值。“以售代赈”，充分体现了书画界、笔墨业风雨同舟、抱团

抗寒的情谊。

五十年代后期，全社会实现私营企业改造、公私合营。全市笔墨行业，以制笔与制墨分类实行业归并。此市，全市尚存的五家制墨企业全部合并为一厂，此五家企业，原本分别均以曹素功、胡开文为牌号，当时的规模、实力初看基本相当，因而合并后难免出现了“名归何家”之争。

清朝徽墨有四大名家：曹素功、汪近圣、汪节庵、胡开文，曹素功位居其首。至合并时，“曹素功”已传承十三代、二百多年历史，而“胡开文”当时执业的为第六代、距创业发展了一百多年。

且当时全国以胡开文为名的墨坊颇多，各字号间多有纷争；而当时上海的曹素功为直系嫡传，……诸多因素，使上海制墨企业合并时，统一归于“曹素功”名下。

当然，这一合并，也使“曹素功”

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由原先家族的世代传袭，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，向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商结合型企业

发展。其规模和实力在全国位居一二。

公私合营后的曹素功，从一个家族品牌，变成了国有的品牌。从原本曹氏一家的曹素功，变成了国有的大家的曹素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曹素功不姓“曹”了。

曹素功改制国有之后，得到了新的发展壮大。在制墨技艺方面，墨厂不仅集中了大量墨模等生产工具，还汇聚原先曹素功和胡开文的优秀制墨名师，如制墨名师朱大寿、汪国耀、程加臣、曹春和，描金名师余盛忠、曹妙辉、方有达，雕刻名师汪兴五等，他们都是当年制墨、描金、雕刻的一流高手。真正实现了海纳百川、兼容并蓄，形成既有传承、又有创新的海派墨制作技艺。

因此，此时的曹素功已不再是一家一姓的曹氏墨业，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派墨业代表。

曹素功的生产与发展也重新步入正轨，恢复传统炼烟，进行规模化、标准化生产，油烟书画墨成为其专长的优质产品，墨锭的年产量达三万余斤。“海派徽墨”的道路越走越宽，“曹素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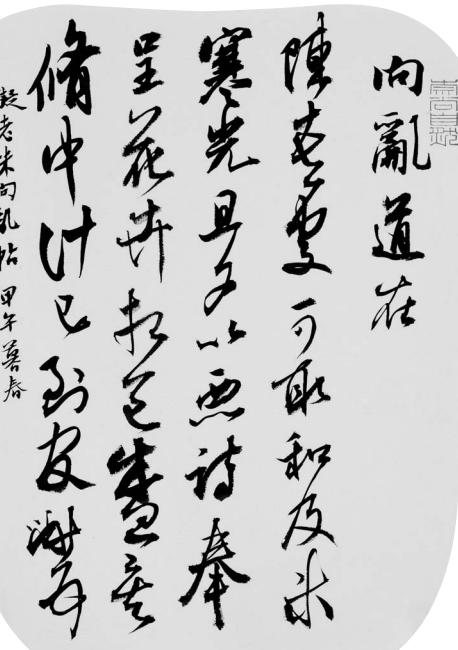
临书手记

王羲之的书法字体面貌不尽相同，大凡有流便和古质两种，《姨母帖》属于后者。清代杨守敬说：“观此一帖，右军亦以古拙胜，知不尚姿致。”此类作品是王羲之早年所写，其结字和用笔都还存有较浓厚的隶书笔意，和晋代简牍帛书有相近之处。如“一”“十”“痛”等字中的横画，隶书的笔意都很明显；“痛”“目”“何”等字的转折处都较生拗峭拔，并残存横式。另外笔画质朴凝重，出人笔比较自然，不像唐以后那样强调一笔三折。这些都使作品具有一种古朴高雅的艺术魅力。

《姨母帖》字间多断、顿挫，除“奈何”两字上下牵连，其余都字字独立；笔画凝重、朴拙，其“哀痛摧剥，情不自胜”的心绪直露无遗。《姨母帖》帖中字势，宽广均平，正面迎人，有古体本色，“姨母”二字敦朴圆厚，其横画是弧势，意谓重心居中，无所偏倚。王羲之喜将横画和竖画，变斜变曲，在《姨母帖》的“日、顷、固”字，如画半圆，加强字的动感。

《姨母帖》古貌磅礴，无楷书提按之笔势，亦无后世行书跌宕之意态，光芒尽敛，火气全无，或顿或曳，与隶体也不相同，得知羲之以古拙胜，而不尚姿致。

——王玺



朱国平临米芾《向乱道帖》

临书手记

临帖可以说是我学习传统书法的一条有效捷径，它占据了我学书的大部精力和时间。

关于临帖，我认为孙过庭《书谱》已为我们指明了方法和目标，即：“察之者尚精，拟之者贵似。”虽然只有简短的十个字，却涵盖了大量的信息：首先，“察”的要求是观察细致精微，其目的就是全方位捕捉所学对象的形象特征及技术信息，这里不仅要获取长短、粗细、大小、方圆、浓淡、正奇等外观形态，还要读出快慢、轻重、节奏、气韵、态势、使转等内部要素，最重要的还要从整体上读准通篇的气息。其次，是“拟”，要求做到与原帖之字相似。我认为临帖就很难在这个“似”的解读上，即何为“似”。“似”非“是”也，也就是说临出来的帖要“似”原帖，但绝非“是”原帖。那这个“似”又当如何把握呢？我认为齐白石先生提出的美学理论：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”倒是可以帮助理解这个“似”。从模仿学习的角度来说，要“似”的目的是学习古圣先贤的经典用笔、用墨、及字法、章法，不似的话动作就变形了，也就是没学到。对于先贤们顺势而出的率性之笔，我认为当理解其挥运之理，了解其来龙去脉（笔路），从神态上把握其相似度，而非刻意呆板单一追逐其形似。如此一说似乎又有等于没说的感觉，那么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临某帖后，拿临本与原帖一对比时，会觉得这儿没到位，那儿也差好多，但离开原帖，所有熟悉此帖的人都会觉得非常像，简直就是原帖的感觉。其实我理解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神似”。特别是行草书的临习，我以为切不可过于追求形似。但如果与原帖面目全非而自诩为“意临”，这恐怕就落入“欺世”的行列。

——朱国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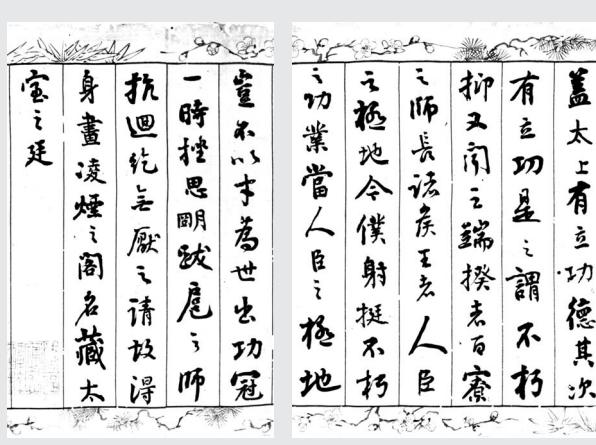


叶菲临赵孟頫《朱子感兴诗》



沈尹默临颜真卿《自书告身帖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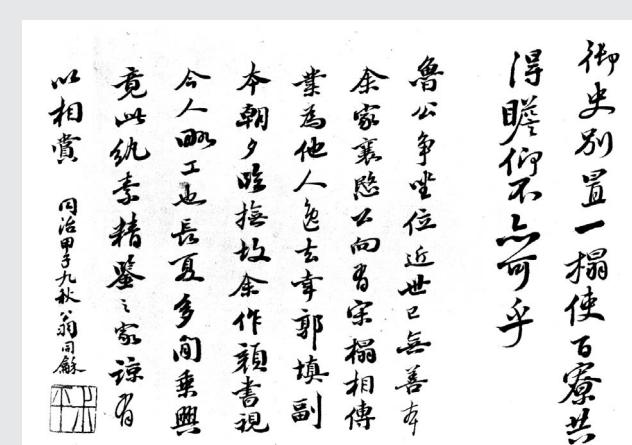
沈尹默规模唐法，毕生致力于二王体系笔法的研究，他与唐碑无所不写。虽致力于褚遂良、二王，也不放弃对颜真卿、柳公权等二王体系之外的书家的追求。其目的在于探究唐碑的笔法。其所临的《自书告身帖》由于写在界格中，因而章法上趋于平整，线条中“屋漏痕”的效果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若我们仔细观察沈的临作，不难发现其对颜真卿的笔法同样是深得其三昧。由于沈自身书风偏于清秀，故而这篇临作整体上也透出了相同的审美特点。



刘墉临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

刘墉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，其书由赵孟頫入手，后转学钟繇、颜真卿、苏轼及各家法帖，中年后自出机杼，形成貌丰骨劲、笔力内蕴的风格。

刘墉此临自运的成分居多，他将鲁公豪宕尽兴、体势飞扬的动势写得雄深雅健、从容不迫，有静中寓动之态，这不得不归功于他深厚的小楷功底。《争座位帖》是一本很难学的字帖，后人无法具备鲁公当时心态，要形神兼备几无可能。临写此帖，当以理解、感悟为上。刘墉的临作着眼点在于书写，于书写中植入他个人的感受，淡淡写来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是临首行多一“功”字，当是石庵眼误。



翁同龢临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

翁同龢别置一榻住百寮，得睡仰不可乎。

(王学良撰文)

名家临颜真卿墨迹集汇 (中)

上海书画出版社供稿